

桑恒昌文本的诗学启示

◎ 马启代

摘要：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追求体现在文本上的感染力成为新诗被人传颂的重要因子和审美质素；桑恒昌先生鲜活、通透、直抵人心的诗歌语言所体现出的艺术神韵和人文关切成为激活现代汉语张力和激发读者心灵认同的无形力量；桑恒昌先生在诗歌“声音”方面的写作实践让我们在追寻现代审美的同时再一次返身关注汉语根部的美妙。

关键词：情感诗学 语象 声音

已近耄耋之年的诗人，依然笔耕不辍，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从个体的侧面佐证着新诗步履艰难却成就斐然的实绩，在这个精神和媒介都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时代，桑恒昌先生的诗歌文本愈来愈显示出标本性的意义。我曾在《桑恒昌：“情感”诗学的布道者》^①和《桑恒昌“寸法”琐谈》^②两文中从“诗学”和“技艺”两个角度对桑恒昌先生的独特贡献做过简单归纳和指认，事实上，将之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我们会发现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对我们反思新诗得失、匡正当下创作所具有的价值。

首先，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追求体现在文本上的感染力成为新诗被人传颂的重要因子和审美质素。在思潮与诗潮密不可分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新诗与大众的关系一直是纠缠在诗人心头无法根治的隐痛，这也许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它的存在正是推动新诗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视或放任自我的责任。纯诗的冲动力和大众化的泥淖都不能给新诗更好的出路。桑恒昌先生切近诗学本质的“情感”诗学饱含人性和母语本性，其在社会层面引起的共鸣给了我们关于新诗与大众新的思考维度。记得之前我曾说过，在一切处于“你追我赶”的诗学竞赛年代，“快”和“躁”遮蔽了许多真正优秀的诗人和作品，pass 一切的人不但被人 pass，往往自己也成为自己的 pass 者，这里当然不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自我蜕变而是指某些弄潮者的自我解构和退化。而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桑恒昌先生就以“怀亲诗”饮誉诗坛，与当年的“汪国真热”“席慕蓉热”不同，桑恒昌先生具有魔幻般情感冲击力的怀亲诗显然不属于俗常的流行层面，故没有“洛阳纸贵”的高烧，却至今热度不减，他们同时在诗界和社会上不断赢得不同艺术主张和流派、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的喜爱。尽管桑恒昌先生的作品被以高校为壁垒所构筑的学术界重视不足，但先生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已通过不同的途径被人相传。这让人想到当代人对柳永作品的矛盾评价^③。事实上，诗歌与大众的关系正是雅俗关系的反映，而雅俗矛盾既折射出不同艺术审美和价值观的冲突，也显现出不同传播和接受群体的社会身份区别，这一关系贯穿了人类的整个艺术史，不限于诗歌，也不限于中国。就桑恒昌先生而言，他的怀亲

诗写作是他人格精神和情感认知的集中体现,而他以“情感”为核心和艺术源头的书写包含了所有的诗歌文本,成为一种浸润和生发的力量,故感染力成为文本自然形成、传达为读者二次或多次爆发的情感互动,具有了自我生成、延绵不绝的生命力。李少君先生把诗学视为情学^④,叶延滨先生主张的“不黑不黄不灰”^⑤都是对诗歌创作本质的维护,林莽先生也坦言,以为诗所解决的是情感的问题,它不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性表达。在推介桑恒昌先生的“情感诗学”不久,我在梳理古典诗学理论的一个偶然机会,了解到《孔子诗论》的相关资料,“孔子诗论”与人们耳熟能详地从《论语》上摘出的那些不尽相同,它源自十几年前新发掘出的竹简,原存香港地区,现存上海博物馆,它以“主情”说颠覆着我们以往的诗学定论,大学教授们的研究专著已有十几部,应该说已成为学术界的一门学问,但这一成果并未转化在诗歌界。我在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曾讲过这一问题,也曾在多个场合与学院派批评家们有过沟通,桑恒昌的诗歌文本正好可以作为我们审视解剖新诗的典型样本之一,他诗中赤子般的情愫和大悲大爱的情怀执着而热烈,具有传统东方美学和现代艺术审美的多层交汇凝聚。我个人一致认为相对于喧嚣热闹的诗坛,山东诗人相对安静,但潮流之后山东诗歌所显示出的坚毅个性日益明朗,其在文字简约和诗学本质上的坚守犹堪为诗坛榜样,桑恒昌先生的文本在此两点上都有卓越的表现。纵观文学史,凡被人记住并传颂的诗篇,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本体范畴的专业化水准,堪达当时代的艺术高度;二是作品的个性化特征,具有较强的辨识度;三是传播的大众化基础,具有较稳定的接受群体,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到一定“度”的诗人不一定是当时代的“红人”,但一定是留下些许擦痕的诗家。我们知道,多少大红大紫者如落花流水而逝,陶渊明、杜甫这些耀眼的星辰当世发出的不过是被薄雾半遮半掩的微光。如此打探,桑恒昌先生的诗歌所持续发散的情感之光,已经积蓄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能量,自诗坛名宿到市井百姓、从海外文坛到华文诗界,能颂桑诗者已不在少数,你可以不完全认可,但无法视而不见。他的《用生命照亮生命的灯》《生日》《我的家园》《这个夏天从冬季里度过》《再生记》^⑥等等篇什兼具专业化、个性化和大众化的质素,在黄沙漫卷的诗坛上已耸立成一株株高傲的常青树。

其次,桑恒昌先生鲜活、通透、直抵人心的诗歌语言所体现出的艺术神韵和人文关切成为激活现代汉语张力和激发读者心灵认同的无形力量。当然,这里所谈及的“语言”首先指桑恒昌先生诗歌文本的具体言语,包括词语本身形成的字词组合和意象系列,其次包括语象呈现方式和表现形式^⑦,是“意象”的延展定性和新的美学形态指称,是从局部命名向整首诗篇命名的努力,再次,这里所说的“语言”,还关涉桑恒昌先生的谋篇构思和抒情方式,与诗人的整个生命和艺术经验相连。“九叶派”老诗人郑敏先生在谈到对桑恒昌先生诗歌的印象时曾提出了对桑恒昌诗歌语言的疑惑,就是在看似“单调”“缺少光彩”的表象下,桑先生的语言“凝练”“思维跳跃幅度大”“表达到位”“诗思丰富”“有很高的哲学高度”契合“诗的本质”,由此她似乎是自我反问地认为,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普通语言变成诗歌语言。”因为“那一个诗歌语言又太欧化,有时太炫耀了,炫耀奇特,内容又撑不起来。”^⑧由此可以看出,桑恒昌先生的语言魅力无穷,看似简单,实则内藏气象。桑恒昌先生的诗歌语言看似“普通语言”,实际上那才是真正的“诗歌语言”,有着浓浓的“桑味”。作为一种

与自我生命同构的语言形式,桑先生的诗歌魂魄就藏在里面,质朴之美是真正的大境界,带着口形和家乡味的语言如何转化为可以书写、可以朗诵的诗歌语言,这是上帝赋予一个诗人的秘密。据此而论,如果单纯地谈论语言,似乎颇有点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意味,但显然,无论韩东主张的“诗到语言为止”还是后来倡导的“诗到汉语为止”,其所指和能指与我所说的桑恒昌先生的“语言”既有着内涵和外延的交集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韩东在2008年“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所做的《诗到汉语为止》中所发现的那“更加细腻、细致、细微和微妙的语言层面”正是诗本身,这一点与桑恒昌先生的语言向度是基本一致的,要说不同,桑恒昌先生更多地指向人类情感的层面,而韩东所要发现的更多来自“现实汉语”,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藩篱,事实上,那些一直把“语言”视为诗歌唯一圭臬的诗人们大多从反抗意识形态固化和词汇意指板结的行为中做了全身心投诚,从一个先锋者无意间成为顽固派。我在一次中青年诗会上亲历了他们与不同诗学主张者的唇枪舌剑,在他们咄咄逼人的背后其实是严重的偏执。这一点,最初曾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为新诗潮助威呐喊的孙绍振先生早在1997年第8期《星星》上就发出了《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一文,他说中国新诗的危机来自有追求的诗人陷入理念化,他们把表现理念作为新诗的根本任务,导致新诗的艺术准则发生了混乱。而桑恒昌先生是一直坚守了艺术准则和诗歌本质的诗人,站在流派和潮流之外,终于独成一脉,当然,就所谓诗歌“专业领域”而言(这是相对“江湖领域”的一种称谓——笔者注),其实有两脉属于“主流”和“正宗”(这也是不得已套用的术语——笔者注),一脉是那些挑战人类精神极限的诗人,如昌耀,一脉就是承继母语诗学源流的发扬光大者,如桑恒昌,当然市面上还存在着“汉语实用化、工具化的潮流和文学界普遍追求平面化、文本口水化和思维玄学化的现实”,我归纳为“庸俗化、僵尸化和体制化”,这些都是背离了“辞立诚”的汉语美学和精神原则的“伪写作”。^⑨但阅读桑恒昌先生那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热乎乎的诗句却足以唤醒我们的灵性,如“拯救人类/只有两盏灯/一盏握在上帝的手里/一盏举在大夫的手中”(《用生命照亮生命的灯》);如“啊,家园哪/无论多大/也要走出去/无论多远/也要走回来/人不出去心出去/身不归来魂归来的/家园哪/我这辈子很少/在你的上面/总会有一天/我将永远在你的下面”(《我的家园》),再如:“幸亏你的诗句/是一拨就通的号码/等到阴阳两界/由我去建立邦交/塞风老,我会/持灵魂的护照去看你”(《向天一哭——痛悼诗人塞风》)^⑩……无须多举例句,也无须多言,因为桑先生的诗句的确是一拨就通的电话号码,让我们一触就身心颤抖。

再次,桑恒昌先生在诗歌“声音”方面的写作实践让我们在追寻现代审美的同时再一次返身关注汉语根部的美妙。关于汉语诗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直被忽视,一是“滋味”这一点食指先生曾专文谈过,《山东诗人》在编发“名家档案·食指卷”时曾予以刊登;^⑪二是“声音”,作为“音、形、意”合一的古老汉字,独步世界语言之林,独立于诗意美的圣殿。对“声音”的探讨当然源自对“语言”的深层解剖。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作为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逻辑整体状况的描述和概括,在论及语言时曾说:“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⑫显然,弗杰姆逊对语言作为一种潜在的“霸

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说我”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启蒙的立场,创作主体缺乏对既定语言恪守成规的自觉意识,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我说语言”却以一种反启蒙、反文化的姿态去言说自我,张扬个体生命体验,凸显出强烈的逃脱“语言工具论”牢笼的渴望,赵林主要论述的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但他同时认识到“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权利关系,一种语言的结构其规范和规则系统都先于言语行为。由此这种对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和语言自身的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写作悖论性困境的产生。”^⑬应当说,赵林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对有些概念,如“启蒙”缺乏界定,容易导致人们认识上的相左,况且如今看来,“第三代诗歌写作”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也缺乏血脉上的基因,其实际的创作分化严重。桑恒昌先生创作势头最为强劲的时期不但自身在诗歌第一现场,而且作为资深的编辑家和诗歌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深度参与了新时期一些相关的诗歌活动,无论从他自身的学养,还是从他的诗学谱系来看,他深深知道,对于汉语而言,“说”作为隶属听觉系统的诗意传递行为,需要与视觉和灵觉相结合,而且这一规则自文言文到白话文几乎一脉相承。台湾学者张汉良先生在《白话文与白话文学》中曾说:“事实上,白话文(语体文)和文言文并非对立的语言系统;两者并无先验的独立的语言质素,足以作为彼此区分的标准。就语音、语(句)构和语意三层次而言,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有区别,也仅在于语用层次,亦即语言使用者对以上三种层次的惯用的认知、认定和认同问题。”^⑭据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何桑恒昌先生在依然保持旺盛的感受力和创作数量的同时,一些诗作显示出对“韵律”的使用,我想除了他对“朴素”“自然”的惯常追求之外,那些超越于“明韵”的篇章,如《攥着我的半个祖国》《这个夏天从冬季里度过》《野草赋》《萧萧白发》《再生记》《悼念柯岩恩师》等都是把生命体验与诗性感悟深度交汇融合后赋予了文字心跳和呼吸的律动,是刘剑先生说的“节奏”而不是“格律”,是我之“气”论甚而超越于“节奏”。^⑮在西方文化思潮和诗歌现状的背景上(尽管这个背景是被翻译者制造的,或经历了某些过滤,我们只能感受其局部或部分),在与字母文字的交流互动中不同语系的优长自然会有所借鉴。尽管英语的拼音与汉语拼音的规则不同,但以象形为主的汉语和以拼音为主的字母语言在相互转译中自然会加深彼此的影响,激活潜伏在汉字内部的“声音”正像周伦佑们追求的“前文化”能量,^⑯事实上,人类所有的表达其原点都是对世界的“发声”。我丝毫不怀疑汉语蕴藏着巨大的声音潜能,当我们把“声音”作为汉语诗歌有意味的形式,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桑恒昌先生在“声音”上所踏出的明明暗暗的韵脚。其实,以往的研究人们一直把“声音”纳入“格律”范畴,把一个活的生机勃勃的诗性因子强行按入人为的规范中去探寻,消解了“声音”所具有的现代诗学意义。当然,我并不是抹杀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如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中对“音组等时停顿节奏”和“意群对称停顿节奏”的划分更有学术上的启示^⑰。但如张桃洲先生在《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中所说的,新诗的深层问题在于超越格律。^⑱我希望借此桑恒昌先生的文本给我们的理论和创作带来一些新的启迪。

诗人马非曾在《桑恒昌简论》说:“桑恒昌先生是位把整个生命都投入新诗创作的诗人,苦吟之上,弘扬了中国文化中最为宝贵、最为精髓的诗学精神,彰显了大汉语血脉的澎

湃生命力,在集大成的艺术坐标系上,为汉语新诗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⑨桑恒昌先生的作品给予我们的诗学启示也许正验证着诗人马非的预言!

注释:

- ① 马启代:《桑恒昌:“情感”诗学的布道者》,《中国诗歌》2011年第11期,第120-128页。
- ② 马启代:《桑恒昌“寸法”琐谈》,《黄河诗报》2012年第16、17卷合刊,第310-311页。
- ③ 董娜:《从宋代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矛盾态度看宋代词论发展》,《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75-77页。
- ④ 李少君:《诗歌是一种情学》,《扬子江诗刊》2016年第1期,第9-10页。
- ⑤ 叶延滨:《写诗的,不一定是诗人》,《潇湘晨报》2015年11月1日,第8版。
- ⑥⑩⑮ 桑恒昌:诗集《大声地说着光芒》,德州:德州学院桑恒昌文学馆编印,2019年5月,第7、16、21、86、235、241页等。
- ⑦ 夏汉:《语象的狂欢》,海南:南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页。
- ⑧ 郑敏等:《诗人、诗评家眼中的桑恒昌》,《诗潮》2009年第9期,第9-10页。
- ⑨ 马启代:《当代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山东诗人》2018年春季卷,第299-304页。
- ⑩ 食指:《滋味 韵味——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考》,《山东诗人》2014年春季卷,第119-124页。
- ⑫ [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 ⑬ 赵林:《从“语言说我”到“我说语言”——韩东、于坚的诗歌作品的另一种解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83页。
- ⑭ 转引自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读书》2008年第3期,第87页。
- ⑮ 马启代:《诗人的担当与诗的“气”》,《并州诗汇》2014年第2期,第7-9页。
- ⑯ 罗振亚:《“非非”诗派:还原“前文化”的艺术探险》,《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第91页。
- ⑰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 ⑱ 张桃洲:《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
- ⑲ 诗人马非:《桑恒昌简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a596c10100f9xw.html(2009年9月2日),访问时间:2019年5月7日。

(马启代,男,1966年7月生,祖籍山东东平,1988年毕业于泰山学院,高级职称,中国诗歌在线总编,出版过诗文集22部,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等多国文字,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评论)